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观照

杨煌辉, 曾楠

(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的凝练表达,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集中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在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观照其价值论, 它从三个层面回答了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 观照其条件论, 它是国力较量中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是社会事业发展的价值召唤, 是多元文化中的价值主流和引领; 观照其整体论, 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公民三者和谐共在的价值表征; 观照其过程论, 它的民族性、社会主义性、时代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而发展, 并以此确证其生命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软实力; 国家; 社会; 公民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00 (2019) 06-0001-07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98}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核心要义, 是直接反映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社会形态的思想观念。任何社会形态都有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核心价值, 并赋予其社会普遍性, 进而使这种价值“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以此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封建社会时期, “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形态长达2 000多年; 在西方, “自由、平等、博爱”成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 直到现在, 依然是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向世界展示资本主义内核、向人类社会传递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也需要自己的核心价值来总括自己的人民性、先进性、实践性, 只有这样, 中国共产党才能夯实执政基础, 更好地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才会深入人心, 获致持久认同; 中华民族才会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十九大再次重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并写进党章, 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素养在于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核心概括, 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条件论、整体论及过程论的内在逻辑。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论

马克思指出: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

收稿日期: 2019-06-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政治仪式与新时代中国国家认同研究”(18CKS057);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中的当代中国政治凝聚力建设研究”(GD17YMK01);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政治仪式与新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2018GZMZBY14)。

作者简介: 杨煌辉(1988-), 男, 广东湛江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曾楠(1986-), 女, 江西吉安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406}价值观作为上层建筑是在人类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意识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践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它的提炼奠立在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艰苦奋斗、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同时又作为中华民族奋斗指针，全面审视国家、社会、公民关系，明确指示新时代的中国将建成什么样的国家、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深刻解答21世纪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公民，勾勒出一幅国家、社会、公民三者和谐共在的美好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3]它把各方面意志凝聚起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充分表达了国家发展的奋斗目标。富强的经济、民主的政治、繁荣的文化、和谐的社会是现代国家的标志。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求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超越资本主义而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是消除剥削、消除贫困，共同富裕。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真实、最全面的通俗表达。文明与富强、民主、和谐始终联系在一起，相互支撑，相互证成，社会主义文明更应体现在制度文明与民族素养上，才能为国家的发展注入持久生命力。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应然形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维护社会基础安定有序、保障广大人民基本权益、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本世纪中叶，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显著提升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下的郑重承诺和奋斗要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凝练地表达了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考察国家的起源及演变，认为社会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是构成整个国家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根基，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社会是国家的微观构造，是国家治理的现实反映，它的发展最能表征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也直接映射出公民的生活样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规定，它们之间相互联系而又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逻辑紧密的价值整体：如自由、平等唯有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才有坚实的基础，通过法治，把国家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才能享有充分自由；又如通过规范市场行为，才能实现社会资料平等交换，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公正是衡量一切社会行为的价值准则，诚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在他看来，公正意味着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4]1}。因而公正亦是法治的价值内蕴，法治与法制的最大区别在于良法善治。传统社会有法制，然而它的法制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法制，它的法制是少数资产阶级维护其共同利益的手段。社会主义法治超越以往社会法制的对抗性，站在人民的立场，是公正的捍卫者，依法维护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从程序和实质上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总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共同筑起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本质。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公民层面的价值观，直观展现了公民的道德要求，是现代国家与理性社会对现代人格的价值规范。人民创造历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亿万人民的事业，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实现国家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实在不易，迫切需用核心价值观统摄人民内部各方面力量来为之奋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基点是每个公民的现实实践，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繁荣国家的现实基础，汇聚起奋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每个公民在生活中都应怀揣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对自己职业的尽责、对他人的诚信和友善,点点滴滴、脚踏实地。现代人格的培养是每个国家塑造国民性的重要任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育传统,然而传统社会的人格塑造是专制权力规训的重要内容,道德教化目的在于维护家长制;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格育化不乏先进理念,然而其实质是通过公民理性最大限度地确保资本增殖自由。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要求真正实现国家、社会、公民价值的内在统一,价值实质超越工具形式,注重实践养成。如“爱国”既讲公民对自己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厚情感,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构成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集体记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同时又要求公民把饱满的爱国精神化整为零,落实落细到具体日常行为中,精业于自己所做的事,服务人民,服务社会。讲诚信、守信义是公民道德操守,又是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的价值自觉。简言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集中表达,体现公民价值理想与具体实践高度统一。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条件论

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就是说,哲学是自己时代的产物。”^{[5]121}价值观是主体对主客关系的认识、评价、判断、情感。作为人类行为反思性哲学,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伟力体现在对一个国家历史条件、民族特色、时代特征、世界定位、现实诉求、未来发展的总括力,并由此产生对民族的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当前,世界各种文化、价值、理念相互交织、互相激荡、竞相发声;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转换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体制深入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重新调整、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这都要求有一种价值观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来阐明社会本质、引领时代潮流、动员民族奋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国情、社情、民情作出的价值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综合国力竞争中中国文

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5}清代学者龚自珍(《定庵续集》)曾说:“欲忘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荣辱兴衰的核心变量,是各个国家与民族的共识。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各国在实力竞争中,经济较量、军事竞赛等直接性对抗已不再是主流,都倾向于将本国的文化影响力和渗透力上升为战略来形塑国家面貌,建构国家话语,提升国家力量,文化软实力正日益渗透到硬实力中,展现其无可替代的一面,经济、军事、科技、外交等文化要素日益深入,谁占据文化软实力的高地,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一个国家的实力内核是文化,文化的底色在核心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归根结底是核心价值观的竞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国家、社会、公民三者的价值力量整合为一体,它的先进性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它的民族性在于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民族凝聚力的文化自信;它的时代性在于吸化世界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呈现与时俱进的实践自觉。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软实力,是先进性、民族性、时代性特质的内在统一,更好地构筑起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立稳脚跟,为提升综合国力赢得战略主动和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价值召唤。“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7]435}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国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的实践诉求,又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社会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实践场域,直接体现与关系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基本权益发展状况。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并作出社会治理水平朝向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提升的要求，传达出国家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中，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建设明确了方法与路径。保障和改善民生关键是要实现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近年来，在党、政府、社会、公众、法治的同向发力作用下，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格局初步形成，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扶贫攻坚等民生利益取得显著成绩，尤其是通过政府的放权和规范，社会组织的繁荣发展为有效保障人们的广泛权益提供科学合理的社会架构，推动基层群众自治生态的完善。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兑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承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继承和发展：自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依法享有广泛的自由；平等、公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平等基础上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法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良法善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多元价值境遇中人们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转向，各国在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中终究回避不了价值“我与他”的厘定。文化多样、价值多元、文明差异共同构成一个多彩的世界，但同时也使得文化领域“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以致“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8]4}。中国和平崛起，赢得世界尊重和赞誉的同时，一些国家也投来焦虑甚至敌对的目光，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失败论”等，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歪曲、误解，企图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对中国意识形态进行重构、颠覆，从而给民众制造思想混乱。另外，随着中国发展已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社会矛盾呈现新特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乎自由、平等、公正的政治问题，处理不好会极大消解人民对中国共产

党执政的信任。“美好生活”是人民大众评判国家文明的切身感受，“美好生活”的定义已超出物质范畴，对政治、文化、生态、健康等方面有着更高、更广泛的诉求，理想和现实的张力容易导致人们在特定环境出现非理性行为冲动。加之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转型、利益调整、价值形构、思想多元难免造成人们价值成分复杂、利益诉求多变、价值秩序失范等现象。诚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9]3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建构、引领及维护社会价值秩序的历史作用，巩固人们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面对国际敌对势力的价值渗透和破坏，核心价值观能够澄清思想迷雾，廓清价值界限，使人们认清“普世价值”的非普适性；面对多元价值的喧嚣，核心价值观能够有效整合价值差异，消弭价值冲突，引领价值取向，在价值认同上找到最大公约数，获致价值共识，增强国家与民族认同。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层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相应地对国家、社会、公民提出不同的价值要求，同时，三个层面价值之间又相互支撑，相互规定，相互渗透，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价值整体。整体性与层次性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3]从某种意义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的内在统一性，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即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公民身份结构关系的合理成分。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次性和整体性，必须理顺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的实体关系，才能更好地理清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价值诉求。

人类社会结构总体上一概划为国家、社会、公

民三大要素。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实践。“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1]362},因而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产生,生产关系复杂程度日益加深,社会阶级、阶层越来越分化,整个社会也越来越“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作为维持秩序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以往社会中,所代表的不同利益、所形成的阶级关系不可调和与严重对立,国家是作为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是统治阶级借以维系其统治的暴力工具,因此,贯穿于国家——社会——公民之间的主轴是阶级与阶级的对抗关系。马克思基于对国家、社会、人民应然关系的理解,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民主共和国,“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这里,国家制度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民,并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0]41}。而社会作为人类历史“发源地”和“舞台”,“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11]413}。由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社会、人民关系的观点阐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自洽性就是要克服以往国家、社会、公民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达致三者良性互动与根本目的一致:国家是社会秩序的保障,是人民幸福的“自我规定”;社会则构成国家合法性来源,是沟通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缓冲场”和“稳定器”;公民是创造历史的实践主体,公民权益是国家与社会的价值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价值联系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公民关系的科学把握,同时又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和合”要义,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整体性要求,是理论性、民族性、实践性的统一。

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是社会和谐的前置条件,亦是公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稳定基础,

亦是公民在各方面充分享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保证;公民具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品性是国家对公民的道德规范,亦是社会生活秩序化对现代人格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层价值关系、价值实体、价值目的紧紧相扣,逻辑严密。经济富强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有序发展,才能为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供稳定的现实基础。资本主义虽然也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法则,但这种“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以资本与私有制作为杠杆,因而形式胜于实质。国家民主职能是充分保证社会生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实现,为“人民当家作主”拓宽参与渠道、丰富民主形式。社会作为连接国家与公民的桥梁纽带,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国家理念、意志、政策、方针要获得公民认同,必须通过社会有效传递到广大群众中去,由此,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内蕴不仅要求形塑一个结构理性的社会,而且是国家基层治理效能的意义所在。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公民是社会生活实践主体,唯有每个公民把内心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外化为在自己公共生活中对所从事的职业精益求精,乐于奉献,与他人友善相处,最大限度化解不和谐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汇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论

马克思主义过程论即辩证发展观表明,“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2]244},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发展的,都有它自己产生的历史、现实存在、未来发展。恩格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应当“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2]69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观念上层建筑,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义,而是随社会主义发展而发展,其价值活力表征于它的民族性、社会主义性、时代性。马克思主义过程论表明,它的民族性必然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而不断得以深化;它的社会主义性必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而不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它的时代

性必然随着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动而适时更新自己的价值传递方式。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条件下创造。”^{[1]585}人类生活中，无论是物质世界改造还是精神世界改造，都离不开既定的、过去的历史足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自信的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够作为当代中国人民奋斗的精神指引，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和传诵，是因为它的提炼来源于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内在。如“富强”，中国百姓自古以来就对国泰民安有着深深的祈求，“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管子》），表达百姓艰苦创业、富国富民的生动实践。如“和谐”“诚信”“友善”，老子较早提出关于和谐社会、和谐人际的思想，“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谓之人乐；与天和者也，谓之天乐”（《庄子》）。如“爱国”，就有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千古绝唱。“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虽无近现代意义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但在众多经典文学著作中，有着丰富地反映广大人民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精神的文学素材。关汉卿的《窦娥冤》痛斥了封建专制下法律的不公，“窦娥”的悲惨形象表达了底层人民对法律“公正”的强烈诉求；曹雪芹的《红楼梦》诉说了封建贵族家庭等级关系的荒谬，抨击束缚人性种种不自由的礼法习俗，“贾宝玉”放荡不羁与叛逆的形象突出作者对吃人礼节的鄙夷及对冲破家庭等级壁垒、憧憬“自由”的深切愿望。传统文化毕竟是传统社会落后生产的产物，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固有的

局限性会越来越与现代国家、社会、公民价值目标不相适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自信与自觉，随时代变迁，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一切有利于当代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社会和谐的文化要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根据国家、社会、公民发展的新时代要求，处理好内容衔接与形式展现的辩证关系，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蕴传达、话语建构、价值解释的能力。

纵览党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施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三大历史实践孕育产生了伟大的革命文化和以改革创新等为内容的先进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注入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自改革开放后进入快车道。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但仍未改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财富的丰富使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心转移到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方面，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主题。从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论证下民主制度先进性、人民性、科学性的高度一致。目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迅速，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尚未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从生活实践上看，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基本实现小康，进而对美好生活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制约平等、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如马克思所言“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7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意识反映，一方面要及时根据时代变迁、条件变化对国家、社会、公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作出回应，另一方面又要适时对国家、社会、公民的未

来发展提出阶段性价值要求。可见,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侧重和任务侧重也有所不同,这也预示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拥有广阔的提升空间。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价值引领、价值阐释、价值认同,凝聚各方力量,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意蕴、历史任务也将会在更高层次呈现。

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同时,世界也正处于在变革调整期,国际治理关系、治理格局、治理理念正酝酿着新形塑。在此背景下中国能不能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要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并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重大课题。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开启“世界历史”以来,世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延续至今,当前经济全球化仍然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然而人类发展实践证实,资本主义并不是历史的终结,“普世价值”并不是人类唯一价值。中国全面审视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在建国、富国、强国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的治理理念。以往,基于世情与国情实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就人类文明而言,“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4]60}。这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发展起来的中国更有责任和自信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自己的价值启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阐释力应体现在根据世情、国情变化,审时度势,善于建构话语权,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传递好中国价值。如向世界传达好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性质,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意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与世界人民美好愿景的共通性;向世界传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实质,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向世界传达好灿烂的中华文化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也是世界文明包容互鉴、共荣共生的结果,中华民族历来就爱好和平,天下大同、共享太平一直是人民美好的夙愿,中国人民是敬业奉献、精益求精、信守承诺、和谐相处的。只有建构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引领,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自信地展现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3]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5-05(01).
- [4]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6] 中国孔子基金会. 孔子研究精华:1986-2015版[M]. 济南:齐鲁书社,2016.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W. 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9]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核心价值观——民族的根与魂[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7-31(01).
- [1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下转第71页)

The Policy of Maritime Prohibition in Ming Dynasty and the Business Thought of Fujian Scholar-Officials

LIN Chunhong

(a.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b. Research Center of the Trade History of Fujia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12, China)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unprecedentedly banned on overseas trade, which focused on the trade group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Fujian.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trade in Fujian inevitably contradic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itime prohibition policy. As people in Fujian coastal areas living on the sea, the forming of smuggling trade groups was also a protest of Fujian maritime merchants against the policy of maritime prohibition. Influenced by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Fujian coastal areas, the scholar - officials of Fujian ha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itime prohibition policy and showed a relatively more liberal idea of business. The local gentries in Fujian resigned from their posts also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for maritime trade in various ways.

Key words: policy of maritime prohibition; Fujian maritime trade of smugglers; Fujian scholar-officials

(责任编辑: 练秀明)

(上接第7页)

Theoretical View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YANG Huanghui, ZENG Na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Core socialist values are the concise expression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mainstream values, and the concentrated generalization of the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lies in its Marxist theoretical quality. In view of its axiology, it answers the questions of what kind of country, what kind of society to build and what kind of citizens to cultivate from three aspects; in view of its conditional theory, it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cultural soft power in the contest of national strength, a call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undertakings, and the mainstream and guidance of values in the multi-culture; in view of its holism, it is the value representation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socialist country, society and citizens; in view of the theory of its development, its national, socialist and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develop along with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nfirms its vitality.

Key words: core socialist values; cultural soft power; country; society; citizens

(责任编辑: 杨成平)